

解放初期《展望》周刊 实行公私合营的历史考察*

●杨 华

摘要:《展望》是一份解放前创刊、解放后又复刊的时事述评性质的综合性周刊,在普通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解放初期,它在期刊界较早实行了公私合营,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文章重点分析了《展望》周刊进行公私合营的过程和原因。

关键词:公私合营 《展望》周刊 过程 原因

一、《展望》周刊概况

《展望》是一份带有时事述评性质的综合性周刊,设有固定的专栏、专论和通讯报道,16开本,每期内容约4万字。该周刊1948年5月1日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和他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与之前亦由其创办的《生活》和《国讯》一脉相承,共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历程”^[1]。

1925年10月11日创办的《生活》周刊,最初以“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言论”^[2]为宗旨。邹韬奋担任主编后,《生活》的言论变得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更加激进,最终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而独立。为此黄炎培等人又另行创办《国讯》周刊,共发行上海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昆明版等总计457期,直陈时弊,提倡民主,影响很大,但1948年4月9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是专制的统治无法阻挡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仅仅21天之后,《展望》周刊就摆上了广大读者的案头。

新创的《展望》周刊几乎是《国讯》的原班人马,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在形式上与《国讯》极其

相似,在内容上也继承了其文人论政的一贯传统,言论更加激烈,战斗性更加明确,不仅“大胆揭露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而且“还尖锐地揭穿国民党‘和平攻势’的骗局,向广大人民指出前途,鼓舞人民的斗争”^[3],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支持。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行量就飙升至惊人的53000份。反对政府的杂志一纸风行,自然会招致当局的仇视与迫害。1949年3月19日,刚刚出至第3卷第18期的《展望》,被嫉恨已久的国民党政府无情地查封了。

上海解放后,《展望》周刊在第一时间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登记,于1949年6月1日率先复刊,尚丁任社务委员会主席兼主编。1951年,在期刊界较早实现公私合营。1954年,扩大为新知识出版社,《展望》周刊成为该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1958年,新知识出版社改组为教育出版社,《展望》周刊被划转至人民出版社。1961年停刊。前后共出刊680期。

二、《展望》周刊实行公私合营的过程

作为一份私营性质的同仁期刊,复刊初期的

*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科研骨干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

《展望》周刊在内容和风格上依旧模仿早期《生活》周刊的短小精悍与生动活泼,虽然“整个业务尚在萌芽期内”^[4],但刊物的发展势头良好。《展望》由于认识到邮局发行的重要性,较早地确定了走群众路线的发行策略,很快就从发行低谷走出,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9月的期发行量为45000份,1951年4月的期发行量已达到70000份。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展望》作为期刊界的代表,与《新华月报》、《科学技术通讯》、《新农村》、《学习》、《中国青年》等杂志一道,向全国同行介绍了各自的成功经验。

《展望》是全国范围内较重要的私营期刊之一。1951年前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同志曾多次嘉许,认为“《展望》正走着《生活》周刊的道路,它是为大家所需要的,是有前途的”^[5]。在业务上,《展望》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与相关领导部门沟通,及时地确立了刊物发展方向,即“以全国城市的知识市民、农村的知识分子、中小城市的基层干部为主要的读者对象,为了真正深入这个阶层还需要更短小多样,趣味而不低级,除时事问题外,并谈生活、思想、社会问题,由小见大,使读者提高一步”^[6],并据此而成功改版。在经营上按企业化的要求规范自己,精打细算,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然而,看起来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的私营期刊《展望》,却出人意料地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展望周刊关于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报告》(1951年4月19日),郑重提出:

一、在性质上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请求作5亿元或3亿元(笔者注:旧币1万元约折合新人民币1元)之投资。

二、在政治上明确地予以领导。

三、在发展上请以适当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消除某些人的成见。

四、在人力上请给予相当补充。^[7]

按照《展望》方面的说法,关于公私合营的请求是

经过多方面长期商讨之后作出的慎重决定,是期刊克服当前困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唯一路径选择。

对于《展望》周刊的这一请求,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遂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约请《展望》负责人进行多次协调,于1951年6月13日形成初步意见并以请示报告的形式上报出版总署。该请示报告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展望周刊社请求改为公私合营一事,经邀同该社尚丁同志数度商谈,为协助该社业务上有进一步发展起见,拟同意改为公私合营组织。并由我局投资2亿元,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投资1亿元,共计3亿元。由沪处派员参加该社董事会进行领导。至于其内部管理及业务方针等仍照旧进行,不拟有何变动。现该社正进行整理旧有资产,准备改组。^[8]

从中可以看出,华东及上海方面完全同意《展望》关于公私合营的请求,不仅按下限拟满足其3亿元的投资要求,而且承诺只派员参加董事会,进行宏观性的领导与监督,对具体的期刊编辑方针和编辑业务则不准备有任何干预。没有繁琐的谈判,也没有复杂的上下关系协调,公私合营之事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顺利。很明显,合作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使《展望》周刊在业务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和期刊之间才能够彼此信任,坦诚相待。《展望》周刊在尚未得到高层的肯定答复之前,就先行着手“整理旧有资产,准备改组”,即为明证。

大约一周之后,出版总署正式复函就《展望》周刊由私营性质改为公私合营性质一事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关于展望周刊社改为公私合营事,你局所提意见,我署原则上同意。究竟投资若干,是否由你局投资2亿元即可,希根据实际情况酌定。^[9]

除了在投资问题上有所保留之外,出版总署悉数同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的意见。这或许与尚丁之前的北京之行有关。1950年底,尚丁代表《展望》周刊赴京,向出版总署以及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获得了领导部门的首肯与支

持,为以后顺利实行公私合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7月1日,《展望》被批准公私合营,从此“跨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更快地成长壮大起来”^[10]。仅以1955年为例,《展望》的期发行数即高达30万份之多,是为名副其实的大刊,影响遍及全国各地。

三、《展望》周刊实行公私合营的原因

就解放初期的形势来看,《展望》作为一份私营期刊,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在短期内选择公私合营呢?

《展望》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刊物发展中遇到了亟待解决的困难,具体如下:

一是从政治上说,《展望》这个任务是重大的,但是在配合宣传教育这方面,是做得很不够,配合得不够好,工作上也有缺点。

二是因为是私营的,难免使有些读者存有成见,有些发行干部不予认真发行,更有些地方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自己既不看《展望》,又不经调查研究凭成见反对别人阅读。这种观感,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展望》的正常发展。

三是从经济上说,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以及纸张供应失调,必须适量地购储与订货,资金周转上就显得相当拮据,需要增加资本。

四是由于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发展,需要在人力上有相当的补充。^[11]

四点理由中,政治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自身的历史使命而提出,“配合得不够好”,与其说是期刊待解决的难题,倒不如说这是期刊发自肺腑的一种自我检讨,全然脱却了原有的某种独立性和文人气质;发行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生存环境而提出,由“成见”而产生不良“观感”的,既有读者对象,也有发行干部,甚至还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在如实反映期刊所面临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隐约暴露了期刊界公与私之间的重重矛盾;资金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发展需要而提出,

“纸张供应失调”导致周转资金拮据,道出了私营期刊发展的辛酸与艰难;人员方面的理由基于《展望》的存在价值而提出,“需要在人力上有相当的补充”,不仅婉转地表达了期刊希望公私合营的诚意,而且也表明期刊早就做好了被改组的准备。从小心翼翼的措辞与行文中可以看出,第二条和第三条理由是实质性的,换言之,《展望》之所以要公私合营,是因为自己无法解决遇到的难题,只有政府才可以搭手拯救。可以想见,作为公方的政府以扶危济困者的角色出现,公方强势,私方弱势,公私合营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等。

实际上,《展望》周刊自下而上地提出公私合营之请求并乐意接受领导,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前后我国期刊出版领域的形势变化关系密切。1950年9月,鉴于“出版业长期在反动统治下所受到的严重摧残,一时还不易恢复,国营出版业在领导和管理方面还未完全统一,私营出版业有一部分在经营上遭遇困难,如不设法加以调整,就不足以担负起将要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的任务”^[12],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储安平代表期刊组在全体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认为,全国共有142家公营(包括公私合营)期刊和96家私营期刊,普遍面临稿源缺乏、不易掌握政策、不能更好地结合实际、不能更好地联系读者等问题。尤其是私营期刊,愿意在思想政策上得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希望公营期刊在稿源等问题上能够予以照顾,希望新华书店在发行上能够一视同仁。^[13]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各种期刊应根据其性质及读者对象,逐步做到专业分工,以消除目前存在着的重复混乱现象……”^[14]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指示也完全肯定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成果,并强调“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本着‘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调整公私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以求有计划地充分供给

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这个方针是正确的”^[15]。上海是当时全国出版业最集中的地区，因而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最多，有103人，《展望》周刊的沈鹤如即为其中之一。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采取比其他行业更早的公私合营政策的前提下，作为“政治工作”之一部分的私营期刊要得到发展，不仅每天要应对诸如稿源不足等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更关键的还是要彻底解决新社会与旧角色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对《展望》周刊而言，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公私合营。

相对而言，《展望》周刊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历史渊源也是促使它较早选择公私合营并很快获批的重要因素。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被查封的半年多时间里，应黄炎培先生之邀，中共上海地下党指派王元化（化名王清园）具体负责《展望》的编辑工作。在共产党人王元化的主持下，《展望》一方面仰赖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另一方面利用敌人的自相矛盾之处，使用灵活的笔法，从夹缝中做文章，最大程度地刊发了一批反映解放区真相以及解释中国共产党相关政策的文章。其中一部分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撰写的文章，因为能够直接传达党的声音，还一度成为《展望》的重要卖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展望》周刊是解放前党在上海直接掌握的惟一公开刊物，渊源不可谓不深。也许出于这种原因，“《展望》复刊以后，党和政府对它的关注与帮助是无微不至的，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热烈的爱护和支持”^[16]。我们也可以理解，准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的《展望》，走向公私合营之路就显得合情合理。

此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并存的新闻出版格局曾存在过一段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时，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就彻底完成了转型，形成了一个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建构，我们既可以认为是以党报党刊为中心、以集中统一

为特征的公营新闻出版事业的建立过程，同时也可以认为是私营新闻出版业迅速消亡的过程。从最近的学术动向来看，运用“消亡论”去考察像《展望》周刊一样的传媒机构，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学术界对私营新闻出版业消亡的过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消亡原因的探讨上，多以私营报纸的历史考察为主，所持看法大致有：（一）同意公私合营“只是在经济上有些私股暂予保留，而报纸实际上已成为党报”^[17]的看法，指出公私合营是当时经济形势下私营报业的必然选择，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发行和广告）逐步萎缩。^[18]（二）承认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原因不在于政府方面，而在于私营报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并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业给予了极大的扶助。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19]（三）认为私营传媒的消亡是由其所有制性质、活动特征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表现。随着党的各级机关报逐渐承担起综合性报纸的功能，中央政府各部门报刊逐渐成为本系统指导工作的工具，私营传媒已经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传播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变迁超出了私营传媒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是私营传媒消亡的根本原因。^[20]

第一种看法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强调私营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根源，第二种看法从党和政府的立场出发强调私营报业的自身缺陷，第三种看法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强调私营传媒的意识形态根源。研究报纸的结论，并不必然对期刊有效，但“报刊一家”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毕竟都属于新闻出版业。所以，如果用上述看法来分析期刊，也未尝不可。笔者以为，《展望》周刊之所以选择公私合营，根据它所处的实际情形来判断，应该

说三者兼而有之,只不过存在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四、结语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期刊事业经历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初步建立时期。一方面对旧期刊进行大力的整顿和改造,另一方面创办更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期刊,社会主义期刊事业的创建工作就在私营期刊和公营期刊的此消彼长中急速推进。据出版总署统计,1950年全国有私营期刊113种,占当时全国期刊出版总数的38.3%,1951年的私营期刊也是113种,但所占比例却下降为24.3%,之后私营期刊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截至1952年10月有70种,截至1953年9月有36种,截至1954年12月有29种,截至1955年12月只有9种,到1956年私营期刊就彻底消失了。

笔者以为,在这样一股公营期刊事业高歌猛进、私营期刊事业渐趋衰亡的时代洪流中,《展望》周刊于1951年实现公私合营,不啻可以解读为《展望》选择了公私合营,更可以解读为公私合营选择了《展望》。就一份期刊而言,这种选择可以延长它的生命,使其更好地实现创办者的意愿,为读者服务。就解放初期的期刊整体而言,这种选择使社会主义期刊事业藉此而繁荣,毫无疑问,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参考文献

[1] [2] [3] [10] [16] 尚丁.《展望》周刊始末.

新闻研究资料;16.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187-197.

[4] 各期刊社代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分组会上的工作经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568.

[5] [6] [7] [11] 展望周刊关于请求改组为公私合营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87-189.

[8] 华东新闻出版局关于展望周刊请求公私合营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86.

[9] 出版总署同意展望周刊社改为公私合营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85.

[12]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36-37.

[13] 各分组组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586-587.

[14] 出版总署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651.

[1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642.

[17]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

[18] 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闻大学,2002(1).

[19] 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20] 李斯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

(本文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新闻系)

方正电子发布新一代排版软件——方正飞翔 2011

本刊讯 2011年3月31日,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在京发布新一代排版软件——方正飞翔 2011。

据悉,飞翔 2011 继承了方正排版软件规范、高效、易用的优点,在图形图像、公式编辑、多渠道输出、插件支持等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强大的 WORD 文档兼容、创新的科技公式输入法、高效的长文档处理能力、中文

特色插件等都将给排版设计人员带来新的创意体验。这款产品在支持最新的 CEBX 中文版式文件标准的同时,能够全面支持 PDF、XML 国际标准,可以实现一次制作、跨媒体多次发布,满足数字出版时代阅读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发布会上,方正公司介绍了全新的软件服务模式,飞翔 2011 网络服务

版即采用 SAAS (软件即服务) 理念,用户可通过飞翔互动社区直接下载并体验软件功能;此外,还推出了按年服务的盒装软件版本,适应对安全性要求更好的出版机构的需要。

方正飞翔以大众的价格和高效的排版功能印证了方正电子面对新数字媒体出版时代的决心和信心。

(佳宁)